

◎書評

《經由世界走出我們的路：人的反身性 與社會流動》

莊勝義*

本書是英國沃瑞克大學（University of Warwick）社會學系教授Margaret S. Archer關於施為者（agency）與結構（structure）關係的系列著作之一，這些著都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。它們分別是：*Culture and Agency: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*（1988年出版）、*Realist Social Theory: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*（1995年出版）、*Being Human: The Problem of Agency*（2000年出版）、*Structure,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*（2003年出版）、*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: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*（2007年出版）。如果說施為者與結構是Archer這二十多年來積極關注的課題，一點也沒錯。但若企圖將聚焦在「反思性」（reflexivity）¹的本書，看成

* 莊勝義 Sheng-Yi Chuang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
E-mail: t2640@nknuc.nknu.edu.tw

本文評介Archer, M. S. (2007). *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: Human reflexivity and social mobilit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¹ 針對reflexivity一詞的翻譯，若著重在「內在的對話」，則譯為「反思性」似乎較貼切；但若強調結構對施為者的「抑制」（constraint）與「促能」（enablement）作用下，施為者的作為（實踐或行動）對結構的作用所致的「形構」（configuration）、

是她最成熟的論著，則可能言之過早²。儘管如此，本文評介本書的用意有三：其一，相對於其他社會學理論，國內對Archer社會理論的理解、介紹與應用，顯然不足，期能有拋磚引玉之效；其二，熟悉質性研究者可能多少接觸過關於「反思性」的概念，但像Archer這樣將它聚焦於個人與自然、文化、社會之關係，既深入且有系統地探究與應用，對本地的教育或社會研究社群應該會有所裨益；其三，對本地教育學術界善於掌握新資訊，卻無暇消化成有系統的理論或研究架構，Archer自（1986-1990）擔任國際社會學學會（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, ISA）主席以來，分別從D. Lockwood、R. Bhaskar、R. Harre，以及當代社會理論中，抽取或轉化成她所需的觀念或思想資源，透過系統的分析而賦予概念新義，並依其批判實在論的認識論取向，架構出可行的實徵研究。她持續二十多年的專注與投入，實為一位可借鏡的模範。

Archer（2007: 4）在本書裡將反思性定義為：「所有正常人都享有且常用的心理能力，以思量自己跟社會情境的關係，反之亦然。」對Archer而言，反思性可說是任何社會的必備條件，這意味著「沒有反思性，就沒有社會」（p. 25）。如此看重反思性在社會（學）理論中的份量，顯示出Archer不同於當代社會學理論家之處。從她處理結構與施為者的問題時，針對：（1）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論者和理性選擇論者（例如：M. Weber、K. Popper、R. Boudon）；（2）文化主義者或結構論者（例如：E. Durkheim、T. Parson或L. Althusser）；以及（3）結構行動論者（structurationists，如P. Berger與T. Luckmann、A. Giddens

再生產（reproduction）、「轉化」（transformation）、或「精煉」（elaboration）等可能結果，再對施為者產生新的影響時，則宜譯為「反身性」以凸顯其來回作用力的方向。

² Archer在本書導論第一頁就預告另一專著*The Reflexive Imperative*即將問世。不過，在該書出版前由她主編的*Conversations About Reflexivity: Ontological Explorations*（2010年Routledge出版），可能會先炒熱「反思性」的議題。

或P. Bourdieu)，分別揭露其因偏向個人行動效果的累積、因偏向社會結構力量的發散，以及因將結構與施為者連結起來，而致低估了兩者的差異及兩者的互動效果，所造成的缺失。Archer歸結上述社會理論的疏漏：第一類為「向上合併」(upward conflation)的錯誤；第二類為「向下合併」(downward conflation)的謬誤；第三類為「向中央合併」(central conflation)的錯誤 (Archer, 2003; Vandenberghe, 2008)。此外，在本書標題為reflexivity's biographies的第二章開頭，Archer藉著U. Beck宣稱主體的自由是「反思現代化」(reflexive modernization)的新事物 (*rerum novarum*)，以及她解讀Bourdieu認為反思性總是扮演導引社會行動的次要角色，來為她的假設「有些型態的社會組織比其他社會更能孕育其成員較強的反思性」辯護。

壹、反思性的四種型態

人做為反思的主體，同時具有多樣的的存在樣態，例如：社會人、個性人、生物人等。Archer在乎的是人從跟世界混沌不分的狀態，如何透過具體參與世界的過程，逐漸分化出自我，進而以「自我感知」(the sense of self)為基礎，發展成具獨特自我的 (self)、個人性的 (personal)，以及社會的 (social) 身分 (認同) (identity) 的人？在*Being Human*一書裡，Archer探究施為者的型態生成 (the morphogenesis of agency)，認為構成施為者的力量 (causal powers to agency)，既非演繹，自也不能化約到社會或文化的構成力量 (causal powers of society or culture)，因為人做為施為者，其存在乃先於社會和語言；自我是發生自意識，個人的身分 (認同) 則從自我顯露，而社會身分 (認同) 則發生自個人的身分 (認同)。但是，這些歷程係發生在自然、實踐，以及社會三元交互作用的世界中。於是，她將人區分成三種樣態：由物質條件組成的生物性人們 (persons)、基於人口因素 (像年齡、性別) 的非自願

定位之社會人群 (agents)，以及有共同利益的行動者 (actors)。她也強調有主體意識的「自我感知」跟做為一概念的「自我」之區分，混淆兩者就犯了認識上的謬誤 (epistemic fallacy)——將「我們所認知的事物」跟「事物本身」混為同一存在。

自我感知源於人類與外在世界相當時間的互動，基於這樣的信念，Archer認為，「內在的對話」(internal conversation)是施為者 (agency) 與結構 (structure) 之間互動的核心。透過對自我、社會及兩者的關係之反思性 (reflexivity) 的探究，經由小團體的深度訪談研究，Archer提出四種型態的反思性 (p. 93)：

一、「溝通的反思性」(communicative reflexivity)：在導向行動的過程前，內在的對話有賴他人的成全與肯定；

二、「自主的反思性」(autonomous reflexivity)：維持著自我控制的內在對話，以直接導向行動；

三、「後設反思性」(meta reflexivity)：透過對自己的內在對話的批判反思，以及在社會中有效行動的批判，達成自我監控；

四、「阻斷的反思性」(fractured reflexivity)：無從或沒有能力完成積極意義的內在對話，或甚至其內在對話加深其困惑與迷惘。

如同Lopez (2009) 對Archer這本專著的書評中指出的，Archer的反思性概念既不是心理學的，也不是本質論的。因此，僅憑這四種型態的反思性，無法清楚說明或解釋結構與施為者之間複雜的動態關係。

若將反思性的型態與人們所處社會和文化情境特徵對照，則「溝通的反思性」常用在強情境連續性的時機；也就是說，它常出現在靜態或沒有變動的社會情境，而傾向於再製靜態的社會或文化結構。相形之下，「自主的反思性」較常出現在不連續的情境，此時，人們轉而憑自己內在的資源，在生活世

界中藉實際的策略與獨立的行動過程，得以避免或克服結構的「抑制」(constraint)，或者善用結構的「促能」(enablement)，以實現他／她們的終極關懷。因此，「自主的反思性」常會造成社會流動，而其行動的集體效果，可能再累積為情境的不連續。

「後設的反思性」是發生於不協調的情境，但不強調行動過程的自主性思維，而重在自我監控與批判反思。然而，由於懷疑且不在乎既成的文化和社會結構，當累積到相當的程度，往往會產生強烈的衝擊。尤其，若有攻於實踐策略的「自主的反思性」之參與協調有效的行動，則常會造成社會和文化的變遷。至於「阻斷的反思性」，人們常處於情境的不連續導致放棄內在的對話，愈想只會愈惡化其無力感。當前社會和文化情境的劇烈變動，對於個人的轉化或社會變遷，很難有積極的影響。

以上勾勒在自然、實踐，以及社會三元交織的世界中，Archer的反思性類型，如何與社會及文化情境特徵連結，以解釋社會流動或社會變遷歷程，人們透過其不同的內在對話方式，或追求共同利益，或宣示團體意志，或被動地回應，而成就其獨特的自我、個性、社會與文化身分（認同），以及社會與文化結構的再製、轉化或精煉。

貳、沒有反思性就沒有社會

在*Culture and Agency*一書開頭，Archer即以「文化統整的迷思」(the myth of cultural integration)，揭開她對社會學理論與人類學對「文化」一詞的模糊不清又欠缺分析，強烈的不滿 (Archer, 1988)。即使歷經近20年，本書的出版，也似乎可嗅到她的不滿。然而，Archer不是僅僅消極的表示不滿。相反地，她積極地投入在文化系統、文化結構、文化動力的再概念化，同時從分析的實在論立場，結合社會結構分析與文化分析。「反思性」在早期的人類學者

與社會學理論之漠視下，既不知其意義，也不曉得它的作用，遑論將它理解成一社會歷程（p. 1）。爲了證成「沒有反思性就沒有社會」的論點，Archer（2007: 26）舉了E. Gellner的人類學研究發現，Berber族人可能知道將自身與她／他們的處境連結起來進行反思，並提出她的論點（pp. 27-29）：

一、反思的第一人稱是傳統社會不可或缺的：持續的自我覺知是普遍的社會生活之要件。在開放的系統裡，沒有任何典律（**canon**）可以涵蓋所有的情境，社會成員必須透過反思的自我意識，主動地決定行動，而非全然依賴模仿他人。

二、傳統的實踐需要反思性：早期人類社會重視實踐行動，強調「默會知識」和「具體技能」，這類知能本質上是不易言傳的，因此常以「第二性質」（**second nature**）發揮作用；但不意味者反思的自我監控就不需要了。由於事情會出錯，人也會犯錯，非預期狀況可能出現，所以人們始終要依據情境做選擇或決定。例如：道路駕駛，即使面對所謂的緊急處理程序，駕駛人一樣需要透過自我管控去依程序的建議採取行動，操控剎車減速滑行，而非直覺地猛踩剎車。

三、傳統能有效作用端賴反思性：文化內涵及社會組織，總有內在的矛盾或缺漏，需要人們即興地加以填補或採取行動以爲因應。傳統的作用，一方面依據地位的（**positional**）規範和期望，另一方面依賴著性格上（**dispositional**）的準備行動。此外，還有不確定的互動歷程須完成。Garfinkel所揭露的「反思性的估算」（**reflexive accounting**），說明日常互動構成各種社會生活的重要特徵。

摘示這段文字，旨在凸顯反思的自我意識，是任何社會成爲可能的條件。然而，可以確定的，即使有了反思性，絕不能構成社會。同樣地，即使反思性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之一，也不必排出其他因素同時成爲社會存在的必

要條件。例如：就強調關係價值（relational values）的現代或後工業社會而言，信任（trust）可能是維繫社會穩定極重要的因素。

參、反思性的未來

Archer（2007: 315-316）的暫時結論指出，在現代與初期的全球化社會裡，不同型態的反思性可能需要加以修正與精煉。但下述六項要點，顯然是值得未來持續探究的：

一、巨觀的結構與文化因素，聯合個人的關注（personal concern）以影響反思性的型態

情境連續性→溝通的反思性

情境不連續性→自主的反思性

情境不協調→後設的反思性

二、反思性的型態影響對社會流動的抑制（阻礙）或促能（協助）之立場

溝通的反思性→閃躲的（evasive）

自主的反思性→策略的（strategic）

後設的反思性→顛覆的（subversive）

三、透過人們的聯合行動導向

溝通的反思性→自我犧牲

自主的反思性→自我規訓

後設的反思性→自我超越

四、對流動形式的影響

溝通的反思性→社會不流動

自主的反思性→向上流動

後設的反思性→側面流動

五、累積的巨觀結果

溝通的反思性→社會再製 (social reproduction)

自主的反思性→社會生產 (social productivity)

後設的反思性→社會重新導向 (social reorientation)

六、對哪種機構的影響

溝通的反思性→家庭

自主的反思性→市場

後設的反思性→第三部門

值得留意的，當我們將這六項要點一起看時，難免會有一種印象：在巨觀的結構與文化因素與個人的關注之影響下，人們的反思性型態就可已被確定或定型。然後，藉著這些型態的反思性，可以判斷其對社會流動有關議題上的效果。對社會流動的理論多一些認識的人，可能立刻知道這樣的提法，的確過度簡化。不過，Archer至少已經對人類反思性與社會流動的關係，指出部分值得後續探究的重點。

肆、評論

首先，從Archer這五部關於施為者與結構的關係之專著的風格來看，她慣用的分類方式，例如：將不同社會理論歸類為向上合併、向下合併，以及向中

央合併等，將反思性歸類為溝通型、自主型、後設型，以及阻斷型等，將結構與文化情境分為情境不連續、情境連續，以及情境不協調等，以及將累積的巨觀效果分為社會再製、社會生產，以及社會重新導向等，雖在本書中提供了實徵研究證據，卻不見得對這些分類的合理性及認識論基礎，構成進一步的批判反思或自我監控效果。例如：將Giddens與Bourdieu都列在「向中央合併」的理論，顯然忽視了兩者的根本差異，尤其對Bourdieu的「habitus」的解讀，似乎將「所結構的結構」(structured structure)跟「能結構的結構」(structuring structure)之間的「反身性」關係，硬塞入施為者的反思性裡。又例如：從不連續的情境中發生自主型反思性的人們，是否「隨起隨掃」，從此不著痕跡？或者，當她／他們往後遇到其他情境時，被消除記憶只能以「嶄新的人」因應？跟這個問題息息相關的，如果自我與個人的身分(認同)，都是施為者在「前社會」(pre-societal)的世界裡形成的，則這樣的自我與個人身分(認同)，如何延續或如何變異，而且確保施為者的主體統整與一致性？這可能是Archer必須再針對「身分認同」與「差異」的課題，妥適處理的部分。

此外，儘管Archer將施為者區分為生物人、社會人與行動者三類，但在她／他們與結構的關係之分析時，則又成為抽象的施為者一類，三者之間是否因情境而有換位的可能？在參與世界的過程中，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？尤其社會人中無共同利益者與有共同利益者(行動者)，如何分道揚鑣或裡應外合？如果因聚焦在反思性跟施為者與結構的關係，反而遺漏了人的關係之梳理，豈是社會學理論的常態？

即使可能有上述的不足，Archer在本書所揭露的反思性之兩大課題，或許會為社會理論或甚至是科會科學研究，開啓新的視界(世界)：其一，沒有反思性就沒有社會；其二，有些型態的社會比較能培育其成員高強的反思性。換言之，若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反思性薄弱，則教育理論與實務工作者，是否可

能（或如何）提供協助？

參考文獻

- Archer, M. S. (1988). *Culture and agency: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Archer, M. S. (1995). *Realist social theory: The morphogenetic approach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Archer, M. S. (2003). *Structure,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Archer, M. S. (2007). *Making our way through the world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Lopez, J. J. (2009). Book review. *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*, 34(1), 173-177.
- Vandenberghe, F. (2008). Structure, agency and the internal conversation. *Extrait Reru du MAUSS permanente*. Retrieved June 28, 2010, from <http://www/journaldumauss.net/spip.php?article362>